

中国记者丛书

姚 溱

军事述评选

JUNSHI
SHUPINGXUAN

新华出版社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

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大作家

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习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套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千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套丛书

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选、农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姚 濤 小 传

姚濤，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生于江苏南通县金沙镇。从小刻苦读书，好学上进。一九三八年春，日寇侵占南通，他自南通中学辍学回家，在进步青年中发起组织了救亡团体“友声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在中共江北特委领导下，参加党的机关刊物《大众》周刊的编辑工作，撰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又直接投身抗日武装斗争。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姚溱到上海以大同大学中文系读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二年，因工作需要转赴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做新闻工作，后被调至新华社华中总分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逐渐锻炼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姚溱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参加文委的领导工作，并以姚澄波的化名在《中国建设》杂志任编辑，同时主编《消息》三日刊。随后又负责联系《文萃》周刊（后改名为《文萃丛刊》）并以丁静、秦佐的笔名撰写军事评论文章。从一九四七年初期到一九四八年中期，又用秦上校、萨利根、马里宁等笔名，在上海《时代日报》上连续发表“半周军事述评”，巧妙地介绍和分析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揭穿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谎言，在读者中颇有影响。同一时期，还为香港报刊撰写军事通讯，对传播、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影响，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十月，姚溱在上海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备受酷刑，坚贞不屈，因跳楼报警而负重伤，旋被关入提篮桥监狱医院。后经党组织大力营救，以及其父姚味香利用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关系进行活动，才得保释出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溱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九五四

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历任国际宣传处处长、副部长，一九六二年又兼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外，还担任《红旗》杂志国际问题评论文章的特约撰稿人，世界知识出版社顾问和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在负责国际宣传工作期间，他多次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国党政代表团顾问，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斗争，并率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出访拉丁美洲国家，还参与了党和政府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为在世界上树立新中国的伟大形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姚溱即遭到康生等人的诬陷和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含冤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宣传部召开追悼大会，宣布为姚溱平反。一九八〇年，中央组织部再一次为他彻底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确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目 录

- 1 时局新形势
- 9 战局答问
- 26 战局转换的关键
- 36 岁寒看战场
- 51 两个战场 两种攻势
- 65 论苏皖战场
- 77 论最近战局
- 88 鲁中大战以后
- 92 加强了军略形势
- 97 可怕的四月份
- 107 汶河与松花江
- 115 感慨话长春
- 123 过渡期东北战局
- 131 云冥冥兮欲雨
- 138 大重点与越重点

145 陈刘共军会师以后 山东战事、

— 继续向高潮急进

150 战场七月如流火

158 江淮河汉之间

165 新局面的展开

173 战事重心

180 八方惊风雨

188 后 记

贺赵明

时 局 新 形 势

随着秋风，国际国内的形势到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已产生了法西斯因素——获得超过平时十数倍利润的独占资本家，及那与军需工业资本占领区经济密切联系的军阀分子，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独占性利益，早已不惜与德日法西斯残余相勾结，企图从事新战争的冒险。另一方面，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危机，由于苏联一日千里的复兴速度，由于新兴民主势力的迅速长成，……美国的资产阶级中间派也已逐渐丧失了“在和平竞赛”中超越苏联的信心，并且因此逐渐倾向好战的右派。在好战分子的“备战叫嚣”与挑拨威胁之下，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国际反动集团，梦想在苏联的创伤尚未复原（或苏联尚未握有

原子武器以前)，即刻爆发新的反苏世界大战，他们的口号是：“迟打不如早打”。因此，国际风云异常紧急，战争的边缘已经濒近。

华莱士事件证明了美国反动派的企图已经在美国落后群众中起了若干影响，证明了世界人民反对好战反动分子的斗争已急不容缓。对于斯大林元帅的及时声明，与其鸵鸟式地盲目乐观，还不如把它理解为紧急风云中的指示：他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此“备战叫嚣”的阶段迅速击破国际好战派“立即爆发新战争”的阴谋，他要一切被好战派所威胁而迷茫的中间派认清好战派目前主要是在向国内的“对手”进攻。因此，它鼓励了世界人民，它给了世界人民无限信心，它援助了国际和平合作力量而孤立了国际好战反动派。

然而，国际好战派反动集团的“备战叫嚣”不会因此破灭，相反的会更形嚣张：杜鲁门“目前如同珍珠港事变前夕”的谈话，阿图岛原子弹试验的计划，艾森豪威尔使英的传闻，美国股票市场上军需股票的疯狂暴涨……都是说明了这点。当然，斯大林元帅说得英明：至少目前还不存在战争的实际威胁。由于苏联的力量，美国内部的困难，好战集团内部的矛盾，苏联边疆邻国人民力量的高涨……，好战派要想目下立即以“实际的战争威胁”加之于苏联尚很困难，目前还只是“备战叫嚣”的阶段，它的

目的是：建立国内的新法西斯统治，制造群众中的战争思想，调整反苏集团中的关系，更其重要的是——在苏联的边邻布置“新战争”的阵地。“新战争”必须在这些目的达到后才能放手进行。

于是，在希腊、在伊朗、特别在中国，出现了“前哨战。”——帝国主义企图建立反苏亲帝的专制附庸政权，人民反帝争取独立民主自由，不能用政治方式解决这个矛盾，势必发生武装的斗争。在这一“前哨战”中，好战反动的帝国主义、法西斯及其附庸政权、附庸军队站在一边，他们为迎接新的世界大战、为专制独裁、为征服人民而作战，他们是反动的、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独立的人民则站在另一边，他们为反对新的世界大战、为破坏法西斯的新战争部署、为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为民主权利而作战，他们是进步的、和平的、正义的战争。

二

中国的“前哨战”已经改变了中国内战的面貌。我们应当清醒：现在打的已经不仅是内战，不仅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而且是美国的飞机枪炮在打中国人；不仅是民主自由与反民主自由的战争，而且是民族独立与反民族独立的战争！

因此，出现了内战的残酷性、长期性！

内战的第一阶段业已过去。如果从六月“停战令”期满以后算起，至少这一阶段经过了两个半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半年来美国的协助，已使国军摆好了阵势，它企图以集结的优势兵力一举而歼灭南线的共军，亦即四面围歼中原共军、三面夹击苏北共军、两路围击菏泽共军；如果这一战略企图实现，就可以再集中兵力解决北线共军，造成共军全面崩溃形势，亦所谓“速战速决”。在共军方面，则采取战略上防御之对策，但在战役和战术上亦是力图集结优势兵力取进攻之势，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以便一方面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亦即粉碎对方企图），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地大量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运动战是主力军大量歼灭对方的方法，游击战则是地方武装和民兵消耗对方的方法。两个半月会战的结果，北线共军在晋南、胶济、陇海三处瓦解了对方“吸引兵力”的企图，南线则集中力量在中原突围、苏中（即苏北南线）七战七捷、定陶之战三大战役之中，不但保全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增加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国军折损二十三万员名，结束了第一阶段。这可以说是“绪战”阶段，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突破了“危急的一关”，使“必败与必胜”的态势取得了保证。

如果内战仅仅是内战，那战局发展下去，就无

所谓“绪战”，而可以用更多的“折损国军”来很快达到“使国军知难而退”的目的。可是，内战不仅仅是内战，而是有着国际反动派参预的一面。这样，在美国政策更明朗地从“两面对准”变成“一面援助”以后，美国优势武备对中国人民生长中的武装发生了接战。在这种情形下，不但在四平街之战中证明了“不能达到歼灭对方之目的”的阵地战，一般地应当继续避免，而且在第一阶段中所采用并见诸成效的战役战术原则亦应有所修正。一般说来，这时候由于国军火力加强，战争经验积累等原因，一个善于指挥的战略家，必须要求生长中的人民武装在前一阶段“绪战”胜利的基础上，大踏步后退，使对方交通线延长、兵力分散、军心骄纵、困难增加……一句话：把对方的优势转变成劣势，暴露其弱点。这时候，国军凭藉其“优势”，可能对于“七线三点”的全面进攻目标，获得若干成就；然而由于弱点暴露及共军主力撤退区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必然有生力量更见削弱。共军虽大块根据地缩小，而且基本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可是因其有生力量之保持及增加，可能在内线中及内线外，制造许多的外线包围，“拣赖的吃”，采用灵活的运动战消灭对方的据点和有生力量。说不定，共军还会深入国军的后方，发动游击战争，制造共军发展的新基地。……这样，日益持久以后，这个第二阶段——亦即相持

阶段便进入“末期”，必然在国军后方发生军事、政治、经济上的新危机，如果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第三阶段——亦即反攻阶段的条件便成熟了。

国际上可能还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影响中国“内战”的行程。然而，长期化的“内战”有极大可能是以这样形式演出。不管如何，战争的残酷性、长期性是确定了的。特别在相持阶段中，中国人民将遇到一段非常艰难困苦、迂回曲折却又前途光明的历程。

必须要以无限的坚忍来迎接这段苦痛的历程，扫除盲目的乐观速决思想。这个战争是争独立的，因为要在这战争中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个战争是争自由的，因为要在这战争中取得实现民主的条件；这个战争是争和平的，因为这个战争失败将使好战分子便于进行三次大战，而这个战争不能解决就难以立即在远东进行世界大战。

三

“不仅是内战的内战”进入新阶段后，在战区以外的城市及广大区域里，已经和将要遭到一种更痛苦的考验，这不仅是战争直接的影响：形式上的震人心弦的折损、军事需要引来的严重威胁，政治上较前愈益严密的统治、言论思想上的封锁与麻痹。而且，一些更狠毒的东西会考验我们：美国资本对

于中国经济“支持”的“回光返照”，暂时的“胜利者”在完成“进攻目标”后的“和平”攻势，中间分子的动摇，当局若干改良主义的欺骗，威胁与利诱，镇压与怀柔……。因为今天是一种新式的“内战”，战争的双方不同于廿年前，也不同于十年前；过去所采用的完全封建的方法必然会为现在所采用的封建、法西斯、“民主”的方法所代替。

可是，正是因为“内战”不仅仅是内战，就使中国人民能够最后通过这个考验：

第一，这个斗争是新的民族斗争。不但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会卷入这个斗争，民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开明士绅也必然卷入这个斗争。

第二，美国资本对于中国经济“支持”的“回光返照”不能持续过久，这不仅因为美国经济危机的日益迫近，而且因为这种“回光返照”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贫困，反而制造中国工厂的破产、农村的破产、失业、饥饿以至中国财政的困难，带来更深的经济危机。

第三，中国的“前哨战”大规模扩展以后，不但会引起苏联的更进一步注意，而且会惊醒美国人民大众，在“中国内战”这个美国帝国主义者最薄弱的一环上，最易于被美国人民所攻破。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乃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力

量，在长期战争及土地改革中的壮大，乃是由于中国人民二十多年来战略的教育，已经保证了胜利突破第一阶段的危险，必能最后突破今后的危险，迂回的时局最后必将引向光明。

不能盲目地乐观，必须准备迎接比今天还要险恶十倍的明天；但更不应失败地悲观，尽管有着迂回的现在，却更有着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新形势中应有的态度。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文萃》第一年第五十期，

署名：丁静）